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造反運動的興起

● 印紅標

1966年10月開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運動之一。它進一步鼓動起群眾性派性鬥爭和造反運動高潮，導致了地方和基層黨政領導體系的全面危機，直至1967年的「一月奪權風暴」。毛澤東為甚麼發動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捲入了怎樣的政治和社會衝突？對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一 源起：工作組與「十六條」

按照文革期間的權威說法，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簡稱「資反路線」）是劉少奇以及鄧小平制定的，但是在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劉少奇時，並沒有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概念。兩個月以後，即10月初，毛澤東才發動了大規模群眾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這是為甚麼？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回顧1966年5月至9月的文化大革命歷史。這四個月的運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自5月至7月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主持中共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以及鄧小平按照慣例，通過各級黨委領導運動。在問題比較多的單位，主要是在學校，由上級黨委派遣工作組或工作隊，代行黨委職權。黨委或工作組帶領群眾批判所謂「黑幫」、「反動權威」以及「牛鬼蛇神」，並將不服從領導，甚至冒犯黨委或工作組權威的群眾，定為「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7月18日毛澤東從南方回到北京以後，嚴厲指責工作組的方針是鎮壓學生運動，決定撤出工作組。

第二階段從8月至9月。8月初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劉少奇，決定由林彪取代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通過了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

按照文革期間的權威說法，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劉少奇以及鄧小平制定的，但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劉少奇時，並沒有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概念。

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但是沒有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概念。

7月底劉少奇被批判以後，周恩來接替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陶鑄從旁協助。而另一套重要的領導運動的班子——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工作，是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接待群眾訪問，但它不能下達指示，權力尚不如後來那樣大。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而小組組長陳伯達和實際上的中心人物江青則直接對毛澤東負責^①。

8、9月間，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發展是在8月下旬開始的紅衛兵「破四舊」運動。這個運動以暴烈的方式打擊「牛鬼蛇神」，即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敵人」，其鬥爭矛頭基本指向共產黨外，而不是黨內當權派。中央的宣傳部門以及地方黨政領導對於紅衛兵的這些活動給予讚賞性的報導和支持，雖然也勸告紅衛兵要執行黨的政策。「破四舊」偏離了毛澤東所要求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雖然肯定紅衛兵的活動，但是對「破四舊」運動的方向不滿意^②。

1966年8月下旬開始的紅衛兵「破四舊」運動，以暴烈的方式打擊「牛鬼蛇神」，即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敵人」，偏離了毛澤東所要求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對運動的方向不滿意。

這一段時間，工作組撤出，學校裏一般由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文革委員會」）或它的籌備委員會以及紅衛兵掌權。按照「十六條」的規定，文革委員會由群眾直接選舉產生，是領導運動的臨時權力機構。由於黨委或工作組的深刻影響，文革委員會基本掌握在黨委或工作組曾經信任的學生手中。在許多學校，只是以全體師生投票的方式確認了略加調整的工作組安排的班底。同時，由於血統論的風行，紅衛兵一律由出身「紅五類」的學生組成^③，其領袖人物，往往為幹部子女。例如在清華大學，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劉少奇的女兒劉濤等一批高級幹部子女曾經是工作組扶助的左派學生領袖，工作組撤出以後，他們又成為學校文革委員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而曾經受工作組打擊和排斥的學生有些得到平反，但仍處於少數派的地位，有些則還沒有得到平反。為數甚廣的非「紅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特別是其中的中學生，往往只是運動的旁觀者，或者因為家庭出身而受到打擊和迫害。

在中央，周恩來、陶鑄和王任重也力圖把紅衛兵納入黨組織領導的軌道。周恩來、北京新市委、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以及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三個司令部保持聯繫，並給予他們物質支持。以高級幹部子女為核心的「西糾」發布了一些要求注意政策、不用武鬥、保護老幹部的通令，還出動隊伍，阻止造反派在地質部的靜坐示威。王任重指導紅衛兵發布注意政策、反對打人的呼籲書，還安排北京清華附中紅衛兵去武漢，向為湖北省委問題辯論的群眾作了態度溫和的演講^④。如果繼續這種領導方式，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揭露領導層陰暗面的局面，就難以形成。而毛澤東主張的運動方式是大民主的方式。他要求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成立群眾組織，衝破原有組織紀律、秩序、規章制度的約束，是衝破黨委組織體系的約束，揭露黨內當權派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者。

8、9月間，毛澤東支持了紅衛兵和大串連。紅衛兵形成全國性的運動，毛澤東熱烈支持的大串連並沒有得到領導層的理解和積極反應。毛澤東曾經不止



毛澤東在9月下旬決定批判錯誤路線，要求在林彪的國慶講話和即將出版的《紅旗》13期社論中把他的意圖發表出來，他提出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一次地說：「蘇聯出修正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中國要防修，就要讓更多的青年直接見我。」^⑤

總之，毛澤東對8、9月運動的發展形成了這樣的概念：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的堅定性和徹底性沒有解決。因而他提出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⑥。

二 出籠：《紅旗》社論與中央文件

1966年10月初，毛澤東發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同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貫徹批判資反路線的精神。

江青、張春橋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一些人努力推動毛澤東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9月17日至20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開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張春橋主持，朱成昭、韓愛晶、蒯大富、譚厚蘭等20餘人參加。與會造反學生談到運動的情況，說造反派還在受壓制。他們提出，文革中存在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說周恩來搞調和，和稀泥，是折衷主義。江青看了會議紀錄，說周恩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義。這次會議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召開的，會議紀錄送交毛澤東以後，又加深了他對運動形勢的判斷^⑦。

毛澤東在9月下旬決定批判錯誤路線，要求在林彪的國慶講話和即將出版的《紅旗》13期社論中把他的意圖發表出來。錯誤路線的具體提法幾經變動^⑧。林彪的國慶講話使用了「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提法。《紅旗》13期社論使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社論說：「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社論又說，「十六條」公布以後，整個革命形勢好得很，「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

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周恩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提出了異議。《紅旗》13期社論發表以後，周恩來以提問的方式向毛澤東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周恩來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毛澤東用三個英語詞回答說，原來用 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 (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 anti-revolutionary line (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 reactionary line (反動路線) 好。周恩來說：「我懂了。」顯然周恩來明白了，這是毛澤東不可更改的意見。以後，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口徑講話，但實際上是有保留的⑨。

陶鑄、王任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也有保留⑩。提法上的異議反映了在基本方針、路線上的不同看法。

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另一份重要指導性文件是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的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要點包括：(1) 宣布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以後，不由院校黨委領導，而和地方院校一樣，實行大民主。這就進一步否定了黨委領導院校運動的方式。(2) 提出：對於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並且規定了處理整人材料的方法。中共中央指示：這一文件對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

10月初，有各省及中央各部主要領導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在北京召開，貫徹批判資反路線的精神。會議的主要報告是陳伯達10月16日的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報告根據毛澤東多次談話的精神，由陳伯達執筆，王力協助寫成，中心是總結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兩個月的運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報告的要點，寫入了《紅旗》14期社論〈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陳伯達的報告說，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錯誤的路線，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仍然在繼續。兩條路線的鬥爭一直圍繞着對待群眾的立場和態度問題進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反對群眾、鎮壓群眾的路線。陳伯達說，區別改正錯誤或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眾的態度，具體地說：(1) 是否公開向群眾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2) 是否給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認真平反；(3) 是否支持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批判8、9兩個月資反路線主要是針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陶鑄以及一批地方和部門領導人。但是，毛澤東不想整垮他們，而是希望通過批判，促使他們改變方針和方法，貫徹毛澤東的路線。在這一點上，是與對劉少奇的政策不同的。

三 實踐：造反派的興起與群眾派性鬥爭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帶來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政治和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直至1967年1月的奪權風暴。

周恩來以提問的方式向毛澤東提出不同看法：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毛澤東用三個英語詞回答：原用 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後來改成 anti-revolutionary line，最後還是用 reactionary line 好。

批判資反路線是造反群眾的解放運動。批判資反路線運動給予原來遭受打擊和排斥的群眾反抗當權者的權利，也給予群眾發泄對當權派不滿的機會。這些群眾為了自己的利益紛紛加入造反派，形成廣泛衝擊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聲勢浩大的造反運動。

造反者高舉要求平反的旗幟向當權者發起進攻。他們宣稱：「如果不為過去被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徹底平反，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空談，就是可惡的欺騙。」^①在中央的支持下，一批冤案得到平反。不僅被工作組打擊的學生得到了平反，而且一批被文革委員會和老紅衛兵打擊的群眾也得到了平反。北京六中紅衛兵私設「勞改所」野蠻殘害師生員工，打死本校退休工友徐需田和出身業主的學生王光華的案件被揭露、被批判，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北京六中和北京一中紅衛兵設立的「勞改所」、「監獄」被當作揭示資反路線暴行的典型^②。造反派的平反要求，贏得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同情，而使當權者以及老紅衛兵狼狽不堪。由於5月至9月間，全國各地都有打擊群眾的現象，因而為了平反和追索「黑材料」而發生的衝突遍及全國。

如果說，平反在政治層面上動員了與當權派有矛盾的群眾，批判血統論則在社會層面上發動了更多的群眾。政治上和社會關係上靠近當權派的保守派和老紅衛兵曾經不同程度地讚賞過血統論，把它當作論證自己政治地位的工具。批判資反路線使他們陷入被動，而給受血統論打擊和侮辱的、出身非「紅五類」家庭的青年以爭取起碼的社會尊嚴和參加運動的機會。北京市中學生造反派的一張報紙《中學文革報》，發表了青年工人遇羅克尖銳抨擊血統論的文章〈出身論〉，該報的編者按語說：「過去各中學所普遍執行過的那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重要的工具，也正是反動的唯出身論。」^③受血統論迫害和歧視的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這些人大多同情或加入了造反派。

當然，應當指出，這時的平反活動範圍非常有限。文革領導者不是真正要停止政治迫害，而只是把它作為動員群眾的手段，因而必然導致新的迫害。

由於資反路線是通過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貫徹的，各級領導幾乎人人有份。因而，批判資反路線帶有群眾與領導幹部的群體衝突的色彩。不僅如此，批判資反路線提供了一個群眾發泄對領導不滿的機會。長期積累而不能宣泄的不滿、怨恨藉此機會表達，從而使對當權派的批判一發不可收拾。

那些被批判資反路線解放出來的造反派，在政治上和情感上很自然地傾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當時在造反派中流行的「豪言壯語」是「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一定要為毛主席爭氣」，誓作「中央文革的鐵拳頭」^④。一首造反派的歌唱道：「山連水，水連天，我們和中央文革心相連。」^⑤這並非矯情。

隨着批判資反路線的深入，政治上的對壘形成了這樣的格局：一方是被指責為執行了資反路線的領導幹部和保守派、老紅衛兵，他們的聯繫網絡基於長期形成的共產黨的組織關係和社會關係。另一方是毛澤東支持的，以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的黨內極左派和造反派。黨內極左派在領導層中缺乏根基，而造反派在基層沒有政治地位，只有仰仗毛澤東和黨內極左派的支持才能改變命運。通過批判資反路線，毛澤東和黨內極左派才找到了為切身利益而不妥協地向黨

批判資反路線是造反群眾的解放運動，也給予群眾發泄對當權派不滿的機會。當時在造反派中流行的「豪言壯語」是「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一定要為毛主席爭氣」，誓作「中央文革的鐵拳頭」，使當權者以及老紅衛兵狼狽不堪。

內走資派衝擊的社會力量。造反派的興起，終於使群眾運動的鬥爭目標轉向黨內，對劉少奇和走資派的批判得以大規模地展開。

群眾當中的派別分野，在觀點分歧的背後，也存在着社會背景的差別。造反派當中，出身中等或不好、社會關係複雜、有海外關係、有政治歷史問題、不服從領導、有個人「野心」者比較多，被譏為「社會渣滓派」。而保守派則正好相反，是受領導重視、政治和社會處境較好的人，如黨團員、復員軍人、老工人、出身好的比較多。這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看法，可以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社會背景決定了人們的政治觀點。

在批判資反路線過程中，隨着工人造反派的崛起，不當權的城市階層，學生、工人、一般知識份子、機關幹部當中處境不佳的人們，結成了批判當權派，批判官僚特權的造反派的聯合戰線。

四 後果：黨內抗爭與社會失控

批判資反路線造成了中共黨內新一輪的衝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借批判資反路線打擊了老一輩領導人，權勢迅速膨脹，炙手可熱。周恩來不得不退避三舍，以適應局面。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在文革初期得到毛澤東提拔的左派領導人先後落馬。各省領導，包括為發動批判《海瑞罷官》立過汗馬功勞的上海市委，紛紛陷入危機。

批判資反路線使幾乎整個領導幹部群體從運動的領導者變為被衝擊的對象。他們的形象從共產黨領導的化身、人民利益的代表，變為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壓制群眾的官僚。至此，文化大革命明顯地背離了他們的切身利益。

1966年11月13日，陳毅、賀龍、徐向前和葉劍英對軍隊院校造反派的批評，是表現老幹部們情緒變化的重要徵兆。1967年2月，不滿終於釀成激烈的抗爭。二月抗爭所猛烈抨擊的事情，諸如亂鬥老幹部、搞亂軍隊、不要黨的領導，都是批判資反路線的後果。李先念曾憤恨地說：「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甚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倒了。」很清楚，老一輩革命家的賬是從《紅旗》13期社論，批判資反路線算起的。很多老幹部可以接受對彭真等人的批判，可以接受對劉少奇的批判，但是不能容忍造反派對整個老幹部群體的衝擊和對黨的領導體系的觸動。譚震林講得真切：「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體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⑬

這裏既有理念的問題——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怎麼行？——更有切身利益的問題。黨的組織體系是領導者權力、地位、利益之所繫，是群體利益之所繫，更不要說整個領導層幾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黨委領導運動的方式被衝垮，取而代之的是文革期間特有的領導模式，即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通過電台、報刊等傳播媒介、中央領導人在群眾中的演講、直接與群眾見面的文件、以及間接通過中央控制的群眾組織、群眾大會、群眾小報，領導運動。黨的組織體系也部分地發生作用，但被大大削弱。客觀地說，這種大民主方式不是不要共產黨的領導，而是

批判資反路線打擊了老一輩領導人。1967年2月，不滿終於釀成激烈的抗爭。李先念憤恨地說：「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老幹部統統打倒了。」譚震林講得真切：「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體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圖為在反擊所謂「二月逆流」中召開的批判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大會。

實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拋開地方和基層黨委組織體系的領導方式。在這個模式中，毛澤東個人和以他為首的中央直接與群眾見面，群眾享有毛澤東賦予的廣泛政治權利，而領導幹部卻失去了權力的依靠——黨的組織體系。在這裏，以往黨委和幹部掌握運動的主動權變為由群眾組織和群眾掌握運動的主動權；以往由領導決定整哪些群眾變為由群眾決定整哪些領導。都是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都是政治運動。造反派沒有獨立思想和政治目標，其基本作用是充當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破壞了文化教育界的正常秩序。批判資反路線運動又衝擊了大部分中央部門、地方和基層的黨的組織體系，致使領導機關陷於癱瘓或半癱瘓，基層組織停止活動。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制度是高度一體化的，黨的領導體系的破壞即意味着政治、經濟體系的破壞，必然導致全面的動亂。群眾組織無論如何不可能替代黨組織的作用。批判資反路線的直接嚴重後果之一，是造成了全國全面的半無政府動亂。奪權是這種動亂發展的結果，又加劇了動亂。

五 結 論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是繼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進一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次重大步驟。它的起因是毛澤東對8、9兩個月運動的狀況不滿意，要求排除阻力，以大民主的方式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劉少奇和黨內走資派。

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開始，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才真正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內，亦因此才具有了區別於以往其他政治運動的突出特點：造反派興起與當權派的大規模衝突，形成「革革命者命」的局面，進一步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全面的大動亂。

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開始，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才真正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內，打破了黨委組織體系的控制，普遍地衝擊了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展開了對劉少奇的群眾性批判；從批判資反路線開始，才有造反派的興起、帶有社會性的造反派與當權派的大規模衝突，形成「革革命者命」（林彪語）的局面；從批判資反路線開始，才有了領導幹部群體激烈的抗爭；從批判資反路線開始，才進一步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全面的大動亂。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是在批判資反路線之後，文化大革命才具有了區別於以往其他政治運動的突出特點。

註釋

- ①②⑤⑥⑨ 根據曾經擔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王力的回憶。筆者多次採訪王力。王力已發表的回憶有：〈「文革」第一年〉，《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5期；《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 ③ 紅五類指：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
- ④ 根據筆者對一位原清華附中紅衛兵負責人的採訪。《紅衛兵緊急呼籲書》發表於1966年8月6日。
- ⑦ 根據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967年編寫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年9月—1967年10月1日）》。又據王力1967年11月3日的信，以及王力80年代的回憶。
- ⑧⑩ 9月25日和28日，陳伯達和關鋒接見群眾發表講話時的提法是「錯誤路線」、「錯誤的路線」。陳伯達和張春橋為林彪起革國慶講話時，最初使用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毛澤東原已同意定稿。快到講話時，陶鑄提出，說「反革命」，提法太重。於是，經陶鑄、王任重以及王力向毛澤東提出，毛澤東決定改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這就是林彪講話時的提法。10月1日晚上，張春橋又對毛澤東說，「反對革命路線」的提法文字不通，表達不清楚。毛澤東就說，不要改回去了，以後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王力和關鋒起草的《紅旗》13期社論第一稿的提法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經毛澤東這一說，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共文革小組討論這篇社論稿時，陶鑄、王任重託人轉達建議：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前面加一個「基本上是」或「實質上是」的限制詞，但沒有被採納。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上的分歧，或多或少反映了對發動這一運動的不同看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醞釀，沒有通報周恩來。以上根據王力回憶。
- ⑪ 〈再論堅決平反，徹底平反〉，《首都紅衛兵》報社論，1966年11月30日。
- ⑫ 當時，有關資料廣為散發。部分文章刊登在《中學文革報》。
- ⑬ 《中學文革報》，創刊號，1967年1月18日。
- ⑭ 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首都紅衛兵》報編輯部1967年9月編印：《為毛主席而戰——三司〈首都紅衛兵〉文選》，目錄頁以及頁8、9。
- ⑮ 北京市中學生造反派（四·三派）的歌曲《我們和中央文革心相連》。作曲者為清華附中曾經遭受迫害的音樂教師。
- ⑯ 二月抗爭資料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06—11。陳毅在二月抗爭中的發言是以否定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為前提的。

印紅標 1951年生，現為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講師。已發表〈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小報〉、〈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等論文。